

SERIES STUD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 汪熙 主编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

〔美〕孔华润 著



本书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对华主要政策的形成过程。作者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广大中国读者可以从中学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 熙 主编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

〔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 著

张静尔 译

周敦仁 校
卢义民

1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邬红伟

责任校对 马金宝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4辑)

汪 熙 主编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

[美]孔华润 著 张静尔 译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579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3 000

版 次 1989年8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2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7-309-01921-0/K·62

定 价 1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对华主要政策的形成过程。作者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书中主要采用了美国方面的材料，广大中国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主 编 前 言

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在70年代以前一个时期是以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所创导的“冲击-反应论”(Impact-Response Paradigm)为主流,即:中国近代史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与军事等对中国冲击的反应。7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思想倾向有所转变,开始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与变化来研究中国历史。这就是费正清教授的学生科文(Paul A. Cohen)教授所提出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中心论”(Chinese Centered History of China)。我认为,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史时,两者不能偏废。因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总是在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即使是根植于中国本身所发展的历史事物,也必然会向外辐射并承受外国对这种辐射所作出的反应;而西方冲击的影响也只有通过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才能显露出来。研究国际关系史总会碰到双边和多边的复杂矛盾,但是最主要的应该是当事国的双边关系这一对矛盾。因此研究两国关系史,必须要研究这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即研究中美关系史不但要研究中国,而且要研究美国;不但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反应,而且要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不但要研究这些互为作用反应,而且要研究这些反应通过各自国家内部因素而起的作用及其连锁反应。只有把一个事物的矛盾双方及其运动的全部过程研究清楚了,才能对这一事物有较深刻的理解。

遗憾的是,我国有些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中包括“左”的干扰),而疏于研究矛盾的另一面(美国)以及这一对矛盾相互作用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各种因素

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这些因素大体上包括：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扩张、国内势力集团的斗争、党派之间的权力角逐、政治家的野心及其素质、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权衡、东亚及世界范围的力量均势，等等，最后汇集成一个综合体，即：“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于美国所执行的有些对华政策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批判则不够。更重要的是探索它的政策决策过程，以追溯影响这些决策过程的一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物的因素，弄清它为什么会作出某种特定的反应而不是其他。只有这样，才能把中美关系史研究好。

因此，我们想到翻译孔华润（Warren I. Cohen）教授的这一本《美国对中国的反应》。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也即在不同阶段，美国对华主要政策形成的过程。孔华润教授是美国的知名历史学家，多年从事美国外交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孔教授现任美国密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关系学会（SHAFR）会长，并多年主编《外交史》杂志。他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问世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和外交界的重视，后又补充增订，印刷了第二版。这本中译本就是根据第二版翻译的。我们感谢孔教授给中译本写了前言。

毋庸讳言，虽然孔教授在本书中有很多好的见解，但翻译这本书，不意味着我们全部都同意他的观点。同样，我们也并不主张只介绍那些同我们观点完全一致的外国著作。我们若坚持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那就失去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意义，失去了切磋问题的机会，也就没有我们自己学术上的长进了。

汪 熙

1987年10月于复旦校园

中文版《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作者前言

近闻《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已译成中文，不胜欢欣。此书英文版曾使我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冀望中文版发行以后我能结交更多的中国朋友。

书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1947年到1950年间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探讨，对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如此。若要更详细地了解我的观点，我对政府文件的看法，请参阅拙作《艾奇逊，他的顾问们，对华政策，1949—1950》，见多萝西·博格和瓦尔多·海因德里奇斯合编的论文集《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捉摸不定的岁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80年版）。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主要用美国材料写成。实乃美国学者的一家之言，并非所有美国学者共同的想法，更绝非所有美国人的看法。此书曾受到左派和右派的批评。其最大不足在于引用的中国材料有限。中国学者用中国材料向我们阐明言之有据的中国观点，实在太重要了。我们研究中美关系的西方学者感到，中国学者80年代的贡献非常令人振奋。我们期待着互利互惠的长期合作。

孔华润

1986年4月于密执安州东兰辛市

《美国和世界》丛书编辑前言

从哥伦布西行探索通往古中国的捷径之日起,中国就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呈现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广州是美国获得独立后谋求开发的第一个海外市场。在19世纪,丝绸、茶叶和香料的魅力驱使着新英格兰人川流不息地跨过太平洋。但是我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不久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传教士和商人认为美国的使命是改造中国古老的文明使之现代化,但是中国移民在美国却受到嘲笑和仇视,终于在1882年被驱逐。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继续徘徊在吸引和排斥两极之间。我们宣布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保持和发展在中国的贸易,但是并没有促其实施;我们提倡变革和现代化却对20年代在中国涌现的革命派颀颀疾首。虽然美国人不时对中国表现出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同情,却绝少付诸行动。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只给予道义上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把中国列为第三等参战国,仅给蒋介石以象征性的援助;在雅尔塔,罗斯福事先未征得蒋介石同意便毫不在乎地把“满洲”的铁路和港口控制权转让给了苏联。最终的对抗行动始于冷战年代,那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作出的反应是:拒不承认毛的政权反而与溃败到台湾的、声名狼藉的国民党结盟。

科恩教授对中美关系的深刻剖析把握住了美国在中国遭到失败的本质。从国家利益的大范围看,相对来说中国对美国是无关紧要的。但又存在着建立在天真的种族主义之上的不切实际的向往,科恩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他多次指出:美国作为一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和欧洲有更为紧迫的需要,遂把对华政策置于次要的从属地位。同样有意义的是,由于科恩教授熟知

中国的文化、历史，所以他能够透视美国的对华政策，从而揭示出它在中国人面前显得多么拙劣和愚蠢。在这个新版本里，他引用了最近公布的一些国务院文件，更详尽地叙述了当时杜鲁门政府如何对中国共产党早先提出的建议置若罔闻。更重要的是，科恩教授追溯了 70 年代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从 1971 年尼克松著名的中国之行到 1979 年卡特承认北京政权。当苏联新的侵略行径迫使中国和美国更为接近的时候，他对这种起伏不平，又不时有麻烦的两国关系所作的通盘审视，对匡正美国关于中国的种种不实际的想法至为必要。

此书为美国外交史丛书中的一部。这一系列著作分别回顾了美国对长期以来有重要联系的国家的外交关系。每部书的作者都通过强调外交政策的长期连续性，力图找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具有的特点。希望通过逐个国家的探讨不仅能使读者对美国的外交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认识到过去发生的事件及行为模式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

罗伯特·迪万(R. A. Divine)*

* 罗伯特·迪万是《美国和世界》丛书编辑。本书为《美国和世界》丛书的一种——译者注。

第一版序

几年前,费正清写过一部题为《美国和中国》的书,我无意与之媲美。它始终是一部最好的介绍中国的权威性作品。我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特别是那些谋求制订一项符合美国人民利益和理想的东亚政策的政治家的反应。正如我书中所写的,我日益感到有必要从广泛的国际背景上解释美国的对华政策。但是这本书写得并不满意,部分原因是所知有限,部分由于我想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内容上和丛书的其他各卷重复。不过我强烈地希望读者去关注更宽广的世界舞台及出场的其他演员,我所描述的情节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发生的。

书中许多论点在我早先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探讨过。某些论点如和我过去的相悖,则属于我最近提出的新论断。在用语方面,仍同过去差不多,这是由于在我没有切实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之前不想标新立异。

书中引用的中国资料除注明者外,均系本人所译。引证部分限于直接引用原话或原文。我将乐于和有兴趣的研究者共同探讨其他可用的资料来源。

孔华润(W. I. Cohen)

第二版序

本书第一版受到评论家、参议员、政府官员和教师、学生们的慨然赞许，我自然感到十分高兴。甚至我的子女也对此书有好评。然而在1971年夏天书刚出版的时候，就显然有必要对它加以修订。亨利·基辛格前往北京，中美之间已准备建立一种崭新的、不那么敌视的两国关系。在理查德·尼克松开始他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的前夕，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召集了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邀请我去给各位委员介绍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可是我的出版商对此却无动于衷，因为我的书写到1970年为止，而中美关系的突破发生在1971年。我答应在中美建交后尽快出一个修订本。原想只延搁一年，岂料水门事件，“四人帮”及罗纳德·里根竟给了我七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写了另二本书。

1979年1月30日，我和妻子去华盛顿参加为邓小平举行的招待会，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并排飘扬在白宫。我知道时刻已到，建交在望。美国对中国作出的新反应要求出版《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的新版本，就是这个修订本。

我利用新获得的杜鲁门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重写了第六章的最后部分。原来的后记重写扩展为第七章。其中许多素材引自我为撰写关于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书所收集的研究资料。1971年以后的事态都包括在新写的尾声之中。

我感激J·R·安德森、J·费策尔、J·L·加迪斯、S·戈尔茨坦、W·海因里希斯、M·H·亨特、入江昭、W·拉费伯、S·I·利文、E·R·梅、R·梅塞、M·奥克森伯格、T·G·佩特森、M·J·舍温、R·斯蒂尔、N·B·塔克及A·S·惠廷。他们以自己的

研究作为我提供了有远见卓识的借鉴,还有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参加过的许多令人鼓舞的会议和非正式讨论都对我有所帮助。而我们大家都受惠于多萝西·博格更是众所周知的。我认为这些朋友集体地对这本书的内容负责,虽然他们谁也没有看过这个修订本。

孔华润(W. I. Cohen)

致 谢

在本书稿付印之前,我不客气地交给几位朋友,请他们审阅。贺正(Tadashi Aruga)、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加斯特·迈克尔(Gasster Michael)、斯塔尔·霍尔特(Stull Holt)和小詹姆斯·汤姆森(James C. Thomson Jr.)都向我提出无数建议,我很珍视这些建议,即使有时没有采纳。贾尼斯·科恩(Janice P. Cohen)作为妻子,罗伯特·迪万(Robert A. Divine)作为编辑都阅读了手稿。我的这些读者给我帮了大忙,假如我对自己的作品不是那么自负的话,他们可能会给我更多的帮助。

像每一个从事“美国—东亚关系”研究的人一样,我十分感谢多萝西·博格,我的许多观点都受益于她。我书中的剖析也借鉴了玛里琳·扬(Marilyn Young)的著作。我的意思不是躲在这两位女士后面,掠人之美,只是说明如果没有她们的帮助,我的工作将增加多大的困难,而且不知道我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还有保罗·瓦格(Paul Varg)及几位这里不予署名的中国学者,他们的想法都促进了我的思考。

我不可能把几个国家的图书馆以及美国各地图书馆中为我的研究提供方便的工作人员都列出来,但是,确实再没有什么人比国家档案馆的帕特里卡·道林(Patrica Dowling)及其工作人员更善于合作,更服务周到了。为我提供经费的人就少一些了。我从美国学会理事会得到一笔补助金,从密执安州立大学得到年度津贴,从密执安州立大学“大学研究基金”以及亚洲研究中心得到的资助让我得以进行大部分旅行。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威廉·罗斯(W. T. Ross)对我经济上的困难处境经常给予特殊的关注。

最后,我要感谢许多朋友,包括我的同事和学生,他们并没有报我以虚伪的溢美之词,而是对我书中的引证及多年来得出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太多了,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曾经是老师——我希望在本书出版以后,他们的人数会成倍的增加。

孔华润

目 录*

序幕 蛮夷和进贡制度.....	1
第一章 条约制度的发展.....	7
第二章 美国作为强国出现在东亚	26
第三章 在旭日的映照下	57
第四章 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	87
第五章 在和日本冲突中,中国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110
第六章 共产主义在中国.....	143
第七章 政策上的大偏差.....	190
尾 声 终于恢复邦交.....	209
关于文献与论著.....	220

* 原书有地图五幅,中译本略。

序 幕

蛮夷和进贡制度

在香港乘水翼船穿过通向广州的珠江口,1小时15分钟以后便在澳门登岸,迎面望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丘陵,这些山都具有中国传统山水画所描绘的风格。在这里除了富丽堂皇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偶而见到一个葡萄牙巡警外,周围一切都使你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中国的巍然存在。你能在这块弹丸之地上存在全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恩惠。这一事实闯入你的意识比在香港,甚至新界所感觉到的更为突出。

澳门是北京政府的一个重要外汇来源。在这个到处是红旗和毛照片的地方,你可以悠闲地乘一辆三轮车去半岛东部逛观音庙(观音是广东人对佛教慈悲女神的称呼)。庙外有乞丐沿着雕花的大门一路跑着乞讨。庙里面和各地众多的庙宇一样,并没有什么特色。走进露天庭院,映入眼帘的是在这块殖民地上最不引人注目的景色之一,一排排五花八门的建筑向着地平线延伸,显然是中产阶级的住宅区。但是就你面前的庭院里有座小亭子,亭子表面那种常见的橙红色已经剥落,附近有一张石桌,还有一块匾——它告诉你在1844年7月3日,清廷钦差大臣耆英和美国总统特使顾盛(C. Cushing)在这张石桌上签署了中美两国间第一个条约。

1844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大不列颠之后,美国使中国同它达成一项“和平、亲善、通商”条约。仅仅靠谈判,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勉强承认了美国的重要性。若在5年前,这对清王朝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自从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了接触,60年来

中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允许美国代表以平等身份和他们一起协商。当然，中国仍然自信比美国蛮夷绝对地优越。

美国从英国获得独立后不久就开始向中国进发。当巴黎达成和平调停的消息差不多刚传到胜利者耳边的时候，“中国皇后号”就已经装备齐全被派遣到中国参与贸易开发。美国的对华贸易不再受霸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阻挠。在东海岸的商业界预计可望获得巨额利润，在想象中浮现出一幅和中国通商发财致富的美景。在一度有利可图的与英属西印度的贸易被禁止以后，这确是可望补偿的一种。在此后的50年里，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完全是商业性的。

在美国进入中国的最初年代里，为了遵循尽可能避免政治纠葛以扩充贸易的基本政策，政府的作用维持在最低限度。美国商人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本身的努力，虽然政府以优惠税则给予鼓励并允许商人自己推举一名领事，但不发薪俸。作为追求个人财富的商贾，他们凭自己的能力来到东方，自担风险，在中国当局所允许的自由范围内进行活动。那时在中美两国政府间没有接触，没有条约义务和外交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

中国人给西方商人造成的处境不能说是令人愉快的。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民族意识最强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土是宇宙的中心，即中央王国，并且把一切和他们不同的文化传统都视为劣贱的标记。除中国人以外，其他民族显然都属于蛮夷。欧美人和亚洲内地的部落民族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从东部跨海而来，后者则来自北方的大草原。诸夷来到中国恳求文明的恩赐，中国人并不感到意外，只要这些外来者表现出适度的恭顺，他们就准备慷慨接待。

自古以来中国把和蛮夷藩邦的关系纳入一种进贡制度。从理论上讲，凡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各民族都是进贡的臣属者。这种联系的程式已被高度礼仪化，包括：招待进贡使者、皇帝赐见、朝贺使节磕头施礼，以及接受皇帝恩赐的礼品。最使西方人伤脑筋的是磕头，按宫廷典礼，磕头包括一连串的下跪、伏地拜倒和“磕响头”。一